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58

历史与信仰： 个人的探询

[英] 科林·布朗 著

查常平 译

HISTORY AND FAITH:
A PERSONAL
EXPLORATION



上海三联书店



历史与信仰： 个人的探询

[英] 科林·布朗 著

查常平 译

HISTORY AND FAITH:
A PERSONAL
EXPLORATION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与信仰:个人的探询/(英)布朗著;查常平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 3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ISBN 978 - 7 - 5426 - 4113 - 7

I. ①历… II. ①布…②查… III. ①基督教—研究
IV. ①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4521 号

历史与信仰:个人的探询

著 者/[英]科林·布朗

译 者/查常平

责任编辑/黄 韬

装帧设计/鲁继德

监 制/李 敏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021-24175971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150 千字

印 张/11

书 号/ISBN 978 - 7 - 5426 - 4113 - 7/K · 209

定 价/32.00 元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基督教文化经典系列

主编 查常平

总 序

陈 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

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历史研究中的信仰问题

——中译本导言

历史学家作为人、作为意识生命体，在其主体化的存在本源^①中，他需要利用自己的生命理智去思考他所面对的历史文献（或历史事实）^②，需要带着生命情感去选择哪些文献可以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而且最终要根据生命意志的决断决定把自己有限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对哪些文献的研究之中。“历史内含选择。借助（有意识和无意识）地保留的材料，历史学家只能做出部分的选择。但是，历史学家是根据他设定的问题从这种材料中选择对他而言是重要的东西。”^③换言之，他和常人一样，具有“我思、我爱、我为”的主体化存在能力，即使他可以说他的决断是非常偶然的，即使他是由于某种偶在的原因遭遇到一批历史文献，即使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声称只是要呈现历史客观的本来面目而非要呈现自己主观的思考。但是，这三种情形，只可能发生在历史研究的初期而不是在其

① 详细讨论，参见拙著《人文学的文化逻辑》中“文化的逻辑”部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8—100页。

② “历史学家不是超越于他自己时代的过去的观察者。他不可能像化学家看待他的试管与化合物那样客观地看待过去。历史学家必须通过文献这种媒介‘审视’历史的现实性。那就是他唯一的依靠。”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Charles A. Beard），“那个高贵的梦想”（1935年），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Present*. 2d ed. New York and London: Macmillan, 1970, p. 323.

③ Colin Brown, *History and Faith — A Personal Exploration*, Michigan: Grand Rapids, 1987, p. 54（该页码即本书边页码——译者）。

终结的时候。人要成为一位历史学家而非历史文献馆的馆员，他必须反省自己的历史观是什么，必须沉思为什么选择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并且在生命意志中坚持展开对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的梳理考究、分析总结。在这一切活动的背后，虽然是基于现在去审视过去的历史事实，但在终极的意义上，他必须相信自己的思考、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自己的决断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具有独特的价值，相信他的学术活动对现在与未来的人群认识他们自己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具有某种不可替代的价值。刘易斯·纳米尔爵士提出：历史学家随时应当持守的目标，是要辨别什么是重要的历史事件。他要分辨什么是对这种重要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历史事实。“由于历史学讨论的是特定时空中的具体事件，叙述是其基本的媒介——但受到叙述对象的分析选择的制约。历史学家的功能，类似于画家而不是摄影师的照相机：他要发现、阐明、选择并强调什么是事物的本质而不是不加区别地复制眼前遇到的一切。为了辨别一棵树，你可以看看它的形状、树皮、树叶；你计算、测量树枝，你将不会有任何收获。同样，历史学中举足轻重的东西乃是宏大的纲领与重要的细节；其中必须回避的，是互不关联的叙述的死板堆积。”^①历史学因为讨论的是人及其在世界中的活动，包括历史学家的人，又不只是肉体生命的存在者，而是具有主观的意识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的存在者。所以，历史学研究中内含着主观的价值判断。“道德或心理学的评价，必然内含于把人看作是赋有目的与动机（而不只是作为事件演进中的因果因素）的受造者的审视过程中。历史学家企图把这种评价压制到最小程度的符咒，在我看来似乎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人文研究的目的与方法和自然科学的目的与方法。这种混淆，是过去几百年最大又最具有毁灭性的堕落之一。”^②历史

① See Fritz Stern, ed. *The Vari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Present*. 2d ed. New York and London: Macmillan, 1970, pp. 378 ~ 379.

② Sir Isaiah Berlin,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53.

学的使命,并不像兰克所理解的那样没有主观性的特质:“人们为着将来世代的利益,一度赋予历史学判断过去、指导现在的世代的职责。然而,历史学现在的努力,并不追求这种高尚的职责:它仅仅想展示历史在过去的实际情形。”^①历史学研究对象的主观性与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使历史本身涉及到人的主观性的核心——信仰——问题。

历史学家和常人一样具有信仰的问题。对于任何人而言,他的信仰决定着他的信念,他的信念产生出他关于生活世界与物理世界的观念,他的观念将构成他的意识的泉源,他的意识将引导他的行为,他的行为就会养成他的习惯,而他的习惯便构成他生命的轨迹。所谓历史学家,就是自觉依照他对历史事实、历史言说、历史事件的信仰去重构人类的历史生活的人,即使这种信仰采取的是非常隐秘的形式、不为历史叙述的一般读者所察觉。

历史学家给出的叙述,总是结合着某种观点或视点。这些观点或视点,作为他的价值观的载体,决定着他如何去辨别他手上的材料。他的价值观的基础,是他作为个体生命的信仰。这种“我信”,为一个人成为历史学家奠定了根本的基础。历史学家的信仰问题,隐藏在他所展开的历史叙述之中,隐藏在他所叙述的历史事实之中,隐藏在他赖以叙述历史事实的主观范式之中。历史学家从哪里得着他的历史范式呢?除了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或者从自己的研究活动中总结、抽象、概括出一些历史观念外,没有其他办法。因为,按照科林·布朗的说法,“在对待历史的时候,我们处理的不只是从过去流传下来关于过去的报告。我们并不只是涉及过去的废墟、大量不精确地留存于今天的历史遗迹。我们须诠释与评价一切存到我们手头的东西。我们仅仅通过使用预设、范式和假说才能这样做。这些预设、范式和假说,因着它们是否充分处理了手头的材料而依次显明为有用的或无用的。结果,更好的

① See Fritz Stern, ed. *The Vari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Present*. 2d ed. New York and London: Macmillan, 1970, pp. 55-58.

假说将不得不修正、补充前面的假说。每当人们必须修正审视事物的全部方法时，将出现‘范式转移’。”^①在实际发生这种范式转移的时候，在历史学家提出某种诠释假说、预设的时候，最终迫使他做出选择的决定来源于他的“信”，来源于他对这种转换后的范式解释历史事实、历史言说、历史事件的能力的“确信”，即使他会向同行或读者提供种种辩解的理由说明。后者的情形，可以用如下的话语来描述：“历史学家根据由他人和他本人制定的选择标准，以对事实的暂时选择、暂时的诠释为工作的开端。每当他工作的时候，这种对事实的诠释、选择和整理，因着彼此的互动行为将经历细微也许是无意识的变化。这种互动，也包括过去与现在的相关性，因为历史学家是现在的一部分，他所诠释、选择、整理的事实则属于过去。历史学家和事实是互相需要的。历史学家没有事实便是无根的、徒劳的，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是死的、无意义的。因此，我对‘历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最初回答，即历史学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一种现在和过去的无尽对话。”^②历史学家的责任，在于尝试提出各种新的理论或修正以前的理论，以便解释更广和处理更多例外的历史事实。

一般情况下，历史学家不会是历史事件的经历者或见证者，他是对某种口传的历史言说的书面记录者或整理者。在严格的意义上，他属于历史叙述者的范畴。当一个人在言说某个历史事件的时候，他必然在进行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即使这种选择的自觉性没有历史学家在展开历史叙述时那样强烈，即使他不像历史学家那样甚至带着某种叙述范式、模型去记录历史言说中的历史事件。历史事件的经历者或见证者的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言说选择，取决于他观察历史事件的角度；他观察历史事件的角度，取

① Colin Brown, *History and Faith — A Personal Exploration*, Michigan: Grand Rapids, 1987, p. 35.

②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Trevelyan Lectures 1961. London: Macmillan, 1961. Paperback. Harmondsworth: Pelican, 1964, pp. 29 - 30.

决于他个人的某些意识、观念、信念或者说他的价值观；而他的价值观中最为核心的成分，就是他个人对于某种终极存在的信仰，即便他所发现的终极存在是一种偶像式的、次终极存在者；即便他对该存在者的意识处于某种朦朦胧胧的状态。但是，他相信他所信仰的对象能够为他的生活给出相对于自己而言的完美解答，相信它就是其存在问题的全部答案。用历史逻辑的术语说，这就是历史言说中的“我信”问题。

那么，历史言说者言说什么呢？他无非是对某个个别的历史事件的言说，即对发生在他生活世界中的历史事件的言说。历史事件的经历者，即历史事件的参与者。除了偶然的路人外，历史事件的主要发动者与响应者，一定带着对某种更加美好的生活观念，这些观念或观念体系构成他的价值观。其核心，最终由其信仰乃至信仰体系所决定。这样，和历史言说、历史叙述一样，历史事件的发生依然存在着“我信”的问题。至于这种他所信仰的对象是否有终极的依据，基督教神学对此做出了批判性的回答。

既然被叙述的历史事实中内含着历史学家（历史叙述者）的“我信”、历史言说中有见证者的“我信”、历史事件中的经历者的“我信”；既然历史学的对象是历史言说中的历史事件（口传史）与历史叙述中的历史事件（文献史），那么，历史学最终不可能不面对信仰问题。信仰在历史学家书写历史事实中发挥着什么样的功用？信仰对于历史言说的主体以及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意味着什么？这些属于历史哲学或者历史神学探究的对象。至于历史中的基督教传统，不过是这种“我信”的终极表达，是“我信”的一种典范形式。在人类历史中，即使有的民族内部没有基督徒而表面和基督教无关，但是，其参与者不可能没有信仰。当我们要追究这种信仰的终极依据的时候，这就牵涉到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三位一体——问题，因为在基督教看来，只有三位一体的上帝，才保证了上帝自身作为终极的信仰对象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上帝的三位一体，指上帝在三个位格中绝对差别又绝对相关。这种绝对差别与

绝对相关的圣道，以科学定律的形式存在于自然界，为历史表象之间的绝对差别与绝对相关承诺了终极的依据，赋予历史学家洞悉历史事件之间的差别与关联的能力。这就是科林·布朗为什么说：“实在非常复杂，简单地按照一套假说、范式或某种单纯的统一的世界观是难以处理的。现代科学的世界观，需要得到上帝在历史中的行动所提供的种种视角来补充。为了获得对实在的理解，我们需要尽可能同上帝创造的实在所要求的那些假说和范式一起工作。”^①另一方面，因为作为一种普世宗教，“基督教异常深入地植根于历史之中，所以，在原则上凡是适合研究历史的任何手段与技巧，都适合于基督教的研究。这不是说当这些手段和技巧一旦用于基督教，每个难题将迎刃而解。基督教远远不只是历史重构。要认识它的意义，这包括悔改、信、爱、望。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人才能像基尔克果原本说的那样成为基督的‘同时代人’。另一方面，要在基督教具体的、历史的表达中理解其启示，我们必须根据文本批判、语言学、文学与历史批判的不同学科来研究它。这样的研究，不仅包括作者是谁、文献日期的问题，而且包括对它们的背景、形式、倾向以及思想世界的历史评价，因为它们涉及到这些文献所内含的信息。”^②

科林·布朗主张：除了要关注基督教发生于其中的历史现象外，学者还应当关注终极的存在者——上帝——的启示领域。正是对这些领域的关注，使人能够企及终极的存在本身。他引用耶雷米亚斯(Joachim Jeremias)的话：“今天，伟大的神学需要之一，就是当启示出现在圣道中、在历史中、在自然中、在经验中时对其要有内在一致的陈述。”^③他认为：“存在着三个主要的意义层面：物理世界、人类世界以及与上帝相关联的世界。既在这三个层

① Colin Brown, *History and Faith — A Personal Exploration*, Michigan: Grand Rapids, 1987, pp. 35 - 36.

② Ibid., p. 43.

③ Ibid., p. 71.

面内部、又在它们之间,我们的诠释存在着某种互动。凭借某种现成的知识与诠释框架,我们企及到新的知识内容。”^①他的论点是:“所有的经验(当然包括历史),在原则上都是启示性的。这不是说我们在当时看到了经验的意义,或者说我们必然最终会发现任何特殊事件的启示意义。相反,它意味着:各种事件在原则上都能够从前面提到的三个意义层面来理解:自然的、人类的、与上帝相关的层面。正是在这最后的层面,启示在基督教的意义才得以发生。当我们把一个事件的意义看作是揭示出我们与上帝关系的东西,以及在和上帝的关联中揭示出我们彼此的关系,启示就会发生。我们是否在这三个层面的任一层面发现意义,取决于这里所说的个人、事件或事情之间的互相作用,以及个人的参照框架(frame of reference)。当其中的一个因素存在模糊的时候,意义也会出现相应的模糊。这也许是由于多种要素,如缺乏知识、不恰当的感知、满足于不完善的解释,或不恰当的参照框架。这些因素在意义的所有层面发生作用,它们在启示的层面不亚于在自然与历史的研究中。但是,在启示中,历史从两个方面发挥作用:它是启示的原材料或中介;它也构成参照框架的本质部分。借助这种参照框架,原材料得到解释。”^②上帝的启示可以发生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之中,即在自然界、人类界(心理界、社会界、历史界),其最终的媒介是语言与时间。于是,科林·布朗将类比纳入历史学的语言的讨论范畴。“类比有着两方面的作用:为了理解过去,我们将其和现在的东西类比;为了理解现在,我们也将其与过去的东西类比。”^③“类比的应用,从过去与现在两方面发挥作用;这种功用发生的时间,既在理解圣经历史时,也在理解世俗历史的时候。我们根据现在理解过去,但

① Colin Brown, *History and Faith — A Personal Exploration*, Michigan: Grand Rapids, 1987, p. 73.

② Ibid., pp. 73~74.

③ Ibid., p. 46.

我们也根据过去理解现在。通过不断的接近过程加深理解。为了把握历史,我们需要使用一切适合历史学家的任何技巧;但是,历史本身以及其中内含的实在,必然决定着我们的技巧、修正着我们的种种预设。”^①“历史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事件网络。适用于今天的相同类型的原因和要素(factors),必然在以前的世代发挥过作用。……在特洛尔奇看来,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类比原则。因为,评鉴学(criticism)首先在根本上赖以成为可能的手段,是类比的应用。和我们眼前会发生的并且在我们心中要发生的一切相类比,这是评鉴学的关键。我们眼前所见的欺骗、可疑的举动、神话的构造、欺诈以及结党的精神,是我们用来辨认我们所想起的素材中的同类事情的手段。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保持和标准的、正常的、经过反复证实的事件与处境模式的一致,正是那些发生的事件的或然性的标志。评鉴学,能够承认这种或然性是实际发生过的,或者可以不考虑它。对过去的相似事件之间的类比观察,使将或然性归因于它们成为可能,并且能够用其他事件中已知的东西来诠释某个事件中未知的对象。类比的普遍权能,包括所有历史事件的本质相似性(德语:Gleichartigkeit)。无可否认,这不是同一性(德语:Gleichheit);它为差异保留着全部可能的空间。然而,每种情形下,它预设了普遍相似性的基点,我们从中才能够理解与感觉到那些差异。”^②

作为一种神学语言,经历过启蒙的当代人用类比来理解神迹现象的时候,它就显现出自身的局限性。“神迹是所谓将终断与我们通常的、日常经验的类比的事件的例证。它们迫使我们直面如下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未亲身经历神迹,我们应该完全拒绝接受所有的神迹故事吗?’或者,如果我们接受比如说是《圣经》里的神迹故事而不是从中古教会传承下来的那些,我们又得面对如下的问

① Colin Brown, *History and Faith — A Personal Exploration*, Michigan: Grand Rapids, 1987, p. 50.

② Ibid., pp. 44 - 45.

题:“为什么我们相信这些而不是那些呢?”但是,和我们的日常经验全然无法类比的重要事件例证,是耶稣复活。”^①

至于耶稣复活是否为历史事件,科林·布朗赞同潘能伯格作出的肯定性回答。后者把耶稣的复活当作一个历史事件,它将阐明其余的历史;它预示着历史的终末与上帝的终末论显明。“同耶稣的复活一起,历史的终末已经发生,尽管历史的终末没有以这种方式临到我们。正是通过耶稣的复活,以色列的上帝才具体以某种终极的方式实现了他的神性,并且他现在才显明为所有人的上帝。唯有基督事件的这种终末论特征,才会确立超越这个事件之外上帝不会有进一步的自我显明的事实。因此,世界的终末,其规模将是宇宙性的,且是已经发生在耶稣里的事件。作为所有事情的终末的预演,正是基督事件的终末论特征才能唯一确立这种发展进程,以便非犹太人从此能够承认以色列的上帝为一位真实的上帝,承认他为希腊哲学追寻的那一位、唯一能够自那时以来会被接受的真实的上帝。”^②

1945至1960年间,兴起了著名的圣经神学运动。这场运动,强调圣经的唯一性和上帝在历史中的启示。圣经神学叙述上帝在历史中的行为,其明显的特征是把历史与历史传统“看作上帝启示自身的主要领域”。^③这即是后来潘能伯格所走的神学路线。在回应布尔特曼或巴特的圣道神学的时候,潘能伯格将启示植根于历史之中而竭力削弱文字的启示作用。“对于潘能伯格来说,历史是上帝的行动在人类事物中的外部工作。正是通过历史,我们才能认识上帝。在将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赐予他们应许之地的过程

① Colin Brown, *History and Faith — A Personal Exploration*, Michigan: Grand Rapids, 1987, p. 46.

② Wolfhart Pannenberg ed. *Revelation as History*. Trans. David Granskou and Edward Quinn.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London: Sheed and Ward, 1969, p. 142.

③ Wright, G. Ernest. *God who Acts: Biblical Theology as Recital*. Studies in Biblical Theology, no. 8. London: SCM, 1952, p. 55.

中，上帝‘证明了他自己就是他们的上帝，因为他是为着他们的缘故而行动。在认识上帝的时候，出埃及与占领应许之地被确定为决定性的因素。这在《何西阿书》有如此的陈述，后来又有《耶利米书》。’^①这样的拯救史(saving history)，并不限于出埃及事件与以色列在应许之地的定居。当从预言和终末启示(apocalyptic)的期盼的认知框架来审视的时候，人们可以把耶稣的地上活动、他的复活理解为‘对雅巍自我证明(the self-vindication)的反应。’”^②“启示不是在开始的时候而是在启示历史结束的时候才被彻底理解。”^③“从创世以来，人类的命运被认为是按照上帝的计划展开的。终末启示的思想，构想出一种普遍历史。因此，上帝的启示与他的荣耀转移到全部事件的终末。终末才会显明现在的奥秘，这也是初期基督教的预设。”^④而耶稣的历史，会成全并且修正更早的人们对上帝的理解。对此，潘能伯格评论道：“上帝这个概念，将会成为仅仅基于启示的某种神学的专有概念。……通过修正与转化，它经历了应用于以色列的上帝时期：换言之，它涉及到如下的历史，其中，这位上帝的特征，首先一步一步地展开自身，然后最终带着终极的合法性以终末的在场出现在拿撒勒人耶稣的命运中。关于上帝的真知，首先是从这种历史中获取的；因此，它不能被预设为使把握这种知识成为可能的某种东西。正是这种历史，首先将修正种种对上帝的初步(而歪曲的)表达——的确，甚至是要修正以色列对其上帝的种种表达！因而，所有关于救赎事件的陈述，依然受到‘自下而来的’种种类比的束缚。它们的适用性遵从历史批评的程序。”^⑤

① 引自潘能伯格“论启示概念的教义主题”，in Wolfhart Pannenberg ed. *Revelation as History*. Trans. David Granskou and Edward Quinn.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London: Sheed and Ward, 1969, p. 126.

② Ibid., p. 127.

③ Ibid., p. 131.

④ Colin Brown, *History and Faith — A Personal Exploration*, Michigan: Grand Rapids, 1987, p. 67.

⑤ *Basic Questions in Theology*, vol. 1, trans. George H. Kehm. London: SCM., 1970, p. 53.

和潘能伯格侧重于上帝在历史中的启示不同,科林·布朗本人相信:基督教的启示观,包括《圣经》的历史与普遍历史中的启示、上帝通过圣道的启示和存在于人类经验中的启示。至于历史与圣道的关系,他似乎认同潘能伯格的观点,“就历史和应许的圣道相关而言,历史乃是应许的圣道之延伸;就圣道宣讲启示历史而言,圣道乃是启示历史之延伸。”^①

科林·布朗之所以能够得出上述比较中道的结论,也许和他作为美国富勒神学院高级神学研究中心系统神学教授的身份相关,也许和他对近代以来新教的传统以及基督教的大公传统的理解相关。在谈到为什么要研究历史的时候,科林·布朗引用狄尔泰的话说:“生活的现实束缚并决定着人,他不仅通过艺术而获得自由——像通常证明的那样——而且通过理解历史获得自由。大部分现代的诋毁者,都未曾看到历史的这种果效。历史的这种果效,却在历史意识的更深阶段得到扩充、深化。”^②借助理解历史,人们摆脱现实对自己的束缚。历史研究的目的,乃是通过模型更好地理解实在,是人们从现实的束缚中获得自由解放的一种方式。

科林·布朗的《历史与信仰:个人的探询》,竭力要处理如下这些问题: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能够证实基督教宣称上帝以各种特定的方式于特定的时间里,在历史中的行动?按照主题性的预设探讨历史的合法性何在?基督教基于历史事件的这种宣称,与仅仅把各种宗教假设为历史资料有何不同?他虽然总是没有直接而简单地给出相关问题的答案,但是在他的眼中,基督教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宗教依然有其能够确证的合法性,其根基在于上帝在以色列的历史、在耶稣个人的历史以及在人类的普遍历史中已经做过和将要做的这一切。这甚至包括福音书中所记录的诸种神迹。该

① Colin Brown, *History and Faith — A Personal Exploration*, Michigan: Grand Rapids, 1987, p. 69.

② 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重建续篇”, see W.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7, Leipzig and Berlin: Teubner, 1927, p. 215.